

伊万·伊里因的以强力抗恶思想及其政治诉求

张桂娜

【摘要】以强力抗恶思想是俄罗斯著名政治哲学家伊万·伊里因的重要思想，它从对外在强制措施相对必要性的理论论证出发，最终落实在对国家的合法性与限度的彰显上，使得对抗恶方式问题的伦理学探讨充当了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从其内在的逻辑推演过程来看，既实现了驳斥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目的，也为其国家主义学说提供了理论论证。伊里因的国家主义学说受到以普京为代表的当代俄罗斯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重新审视他的以强力抗恶思想及其蕴含的国家主义学说，有助于我们把握未来俄罗斯社会的发展方向；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政权建设带来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伊里因 以强力抗恶 国家的合法性 国家的限度

【中图分类号】B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6-0138-07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保守主义逐渐复兴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政治哲学家伊万·伊里因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关注，他的作品也成了当代俄罗斯政治家们复兴俄罗斯的重要精神资源。^①伊里因一生著述甚多，在政治哲学、伦理学、法哲学等领域提出过不少极具当代价值和意义的观点，然而，在他所有的观点中，能够作为他的理论标签的则非他的以强力抗恶思想莫属。以强力抗恶思想是伊里因对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批判和反思，虽然从研究对象上来说这是一个伦理学领域的问题，但是，哲学家的最终关切却在伦理学之外，他提出以强力抗恶思想的目的是要论证国家的合法性和国家权力的限度。重新审视伊里因的以强力抗恶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问题在俄罗斯政治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未来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伊里因关于国家合法性和国家权力限度的思考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政权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138

一、伊里因对以强力抗恶的必要性的论证

以强力抗恶思想的提出，源于对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批判，因此，作为探析以强力抗恶思想的理论背景，在此有必要先简单地概述一下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托尔斯泰将基督的实质理解为不抵抗的爱，在他看来，所有的外在强制措施都是有违基督意志的暴力，面对邪恶行为的侵害，采取默默忍受的态度，是对基督训诫的遵行。假如使用外在的强制措施强行地阻止邪恶行为，则是对基督训诫的背离，因此，他反对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出于任何目的、以任何方式、向任何对象实施外在的强制措施，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着对邪恶行为的强行制止。而且，他还

^① Путин читает Иван Ильина// <http://brehlama.ru/?id=15008>.//Путин читает Ильина и размышляет о призвании политика//<http://brehlama.ru/?id=15224>.

用一个感情色彩极其鲜明的贬义词“暴力（насилие）”来指称外在的强制措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反对使用外在强制措施抵抗恶的学说被归结为勿以暴力抗恶思想。与这种勿以暴力抗恶的社会道德观相适应，托尔斯泰在政治上持一种否定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他认为，国家政权、警察机构、司法组织等制度设置都是外在的强制性机构，在人类历史上，这些强制性的机构不仅没有有效地阻止人们邪恶的行为，相反，它们本身都是行恶的主体，所做的也只是压迫、欺凌、侮辱、奴役、拷打、监禁、死刑等以暴力为实质的活动，因此，他完全否定国家及其组织机关存在的价值，主张人类回到没有政府的原始自然状态。

伊里因反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及其无政府主义学说。他认为，外在的强制措施是一种中立的物质手段，就其本身来说，它与善恶无关。它只有在被无条件地滥用的情况下，才会成为服务于邪恶目的、践踏良善的暴力；而在使用得当的情况下，则可以成为制止恶行、捍卫精神价值的强大力量，因此，与托尔斯泰不同，他用一个不具褒贬色彩的中性词“力量（сила）”来指称外在强制措施，谴责应受批判的暴力（以强力抗恶的相对性），同时为使用得当的外在强制措施进行辩护（以强力抗恶的必要性），他的这一学说也因此被称为以强力抗恶思想。

面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伊里因首先论证的是外在强制措施的必要性。

首先，善与恶的内在性给予外在强制措施被使用的可能性。在善与恶的判定上，伊里因是绝对的动机论者。他认为，真正的善与恶存在于内心世界，不是存在于外在的物质世界、人的身体动作和行为，外在的物质进程无论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灾难，还是带来无限的财富和幸福，“就其本身来说，它都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① 同样，假如单独审视人们的外在行为和身体动作，而不考虑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灵魂和精神状态，那么，它们本身也都不是善的或者恶的，因为善与恶的真正处所是人的灵魂。这意味着，外在行为的善恶并不由其自身的外在特征决定，而是完全取决于他内在的灵魂和精神状态。同时，这也意味着对恶的彻底战胜，只能通过人内在的积极的精神努力使人的灵魂与精神状态得到改造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里因认为，托尔斯泰主张通过精神措施战胜恶的诉求具有绝对的价值和意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

突显出了托尔斯泰彻底否定外在强制措施的无根性。既然外在行为的善和恶都取决于行动者的内心，那么，外在的强制措施究竟是不是行恶的暴力，这要由强制措施实施者的主观意图和实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而不应由强制措施自身的外在强制特征和不完善性来决定。外在的强制措施不应当是恶徒的专利，不一定就出自于有着邪恶居心的灵魂，它也可以成为保护一切精神价值的有效手段，是高尚之士的无奈之举，因为从善与恶的性质来看，追求道德完善的人并没有完全失去使用外在强制措施的可能性。

其次，善与恶的外化本性决定着外在强制措施被使用的必要性。虽然真正的善与恶仅存在于内在灵魂中，但由于人是兼具精神与肉体的二重存在，内在的灵魂与精神状态既可能无意识地体现在外在的表情、声音、举止、语气等身体行为中，又可能被有意识地在具体的行动中实现出来，从而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他人传递着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正如伊里因所说：“在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中所出现的任何一个善的或者恶的事件都不会成为他孤立灵魂的特殊表现，它总是会通过上千条途径向他人显现、表现并传递出去的，而且，不仅在这个人希望如此的情况下，而且在他不希望如此的情况，都会是这样的。”^② 恶和善能够经由人的身体走出灵魂，转化为外在的行动，它们可以在不知不觉间传递给其他的人，改变他们灵魂的内在结构，从而给他人带来真实的帮助或者伤害。既然如此，当转化为外在行动的恶开始侵害善的力量时，善的代表就没有理由袖手旁观，而是应当采取有效的外在抵抗措施去阻止恶的外在行动，否则，就会使善的力量遭到破坏，使恶的势力得到助长和纵容。对此，伊里因解释道：“假如人是纯精神的、完全无肉体的存在物，那么，与恶的斗争就可以局限于灵魂—精神的努力与活动，那时，良善之人对恶徒的肉体强制就不被允许。但事实上，世界是按另一种方式安排的，那么，这就完全是被允许的了。”^③

可以说，在伊里因看来，虽然外在强制措施具有

① Иван Ильин.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ю//Почему мы верим в Россию. Москва, 2006. С. 388.

② Иван Ильин.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ю//Почему мы верим в Россию. Москва, 2006. С. 508.

③ Иван Ильин.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ю//Почему мы верим в Россию. Москва, 2006. С. 477.

外在的强制性和不完善性，但是，它却是保护精神价值的有效手段，追求道德完善的人使用外在的强制措施抵抗恶，不仅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也有实践上的必要性；既有道德上的可论证性，也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二、伊里因对以强力抗恶的相对性的论证

伊里因主张实施有效的外在强制措施来抵抗邪恶力量对善的真实侵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随意地、甚至是炫耀性地实施外在的强制措施。相反，他指出，外在强制措施的实施需要十分谨慎，不是在有能力实施的时候就去实施它，而是在真正需要实施的时候才去实施它。事实上，伊里因所尽力证明的不是以强力抗恶的绝对必要性，而是它的相对必要性，他对以强力抗恶活动的有效对象、实施主体、抵抗时机都有着严格的限制。

第一，以强力抗恶活动的有效主体。伊里因提出“能否以强力抗恶”这个问题所面向的是追求道德完善的人，而不是泛泛的、抽象的人，也不是有意为恶的人。只有站在追求道德完善的人的立场上，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才有意义。相反，站在有意为恶的人的立场去讨论它则会使它成为一个伪命题，而且，真正的恶徒也不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在伊里因看来，“这是进行此项研究所必须遵循的界限，超出这个界线，整个问题就失去了自己的哲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因为下面的这个问题是不值得问的：希望恶意地推动他人的灵魂去作恶的恶人可以被允许做什么？这样的恶人什么都不允许做。恶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不问这个问题，而是自己允许自己做一切的事情。整个问题的提出不是代表恶人，而是代表那些爱善的、完整地并且真诚地为善服务的人。”^①因此，以强力抗恶活动的有效主体是追求道德完善的人，这样的人不仅需要具备正确地感知恶、辨别恶并且不受恶的污染与诱惑的能力；还需要对善怀有炽热的爱，他不会无所作为地看着恶欺凌善，而是带着强大的行动能力站在善的立场上在外在世界中积极地与恶展开斗争。

第二，以强力抗恶活动的有效对象。伊里因具体区分了恶不同的存在形式：（1）邪恶的情感和欲念，它们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是产生邪恶意志和邪恶行动的深层动机，是人身上最难克服的恶，但是，只要

不转化为外在的行动，它们就不会给他人带来外在的伤害；（2）邪恶的意志，它是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力求向外表现自己的邪恶力量，是促使人们做出邪恶行动的决心；（3）邪恶的行动，它是对邪恶情感和邪恶意志的实现，是对一切精神、自明性和爱的力量的真实侵害。以强力抗恶活动的作用对象虽然是恶，但并不是所有形式的恶，而仅仅是在外在行动中真实地实现出来的恶，正如伊里因所说：“身体上的强迫和消灭措施与恶自身并没有关系，而仅仅与恶的外在表现有关。”^②外在强制措施的特点在于其影响外在行为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但是，它没有办法改造人内在的灵魂结构和精神状态，相反，它对内在主观领域的强行介入只会带来消极的后果，比如，迫使一个人接受某种信仰或者去爱某个对象，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会使他变得虚伪，他会假装接受那种信仰或者假装爱上那个对象。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可能会使他失去信仰和爱的能力，使他成为一个不相信任何价值的虚无主义者或者一个不会真正地去爱任何对象的冷漠之人。邪恶的情感、欲念和意志属于内在的主观领域，外在的强制措施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在制止邪恶行为的目的达到后，对外在强制措施的实施应当立即停止。

第三，以强力抗恶活动的有效时机。针对恶的不同形式，伊里因提出了不同的抗恶措施，而且，不同抗恶措施的实施还具有先后主次之别，他说：“对恶的抵抗应当通过以下措施：第一，对恶的情感的内在消解、转化和改造；第二，对恶的意志的内在—外在的强迫和惩罚；第三，对恶的行动的外在强迫和消灭。此外，后面两种抵抗方式应当为第一种方式服务，就像低级的层次为高级的层次服务那样，不能取代第一种方式，而要走向它，使它成为可以实现的。”^③伊里因主要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措施：即自己主动实施的内在精神措施、来自他人的精神措施和强制措施，前两种措施所要实现的是对恶的情感的克服和对恶的意志的抑制，而后一种措施所针对的则是恶的外在行为。虽然说这三种不同的措施各有不同的作用范围和特点，但是，恶的内在本性决定着彻底战胜恶

① Иван Ильин.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ю//Почему мы верим в Россию. Москва. 2006. С. 475.

② Иван Ильин.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ю//Почему мы верим в Россию. Москва. 2006. С. 478.

③ Иван Ильин.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ю//Почему мы верим в Россию. Москва. 2006. С. 506.

的标志是对恶的情感的全面消除，是将人身上反精神的、与爱相悖的情感转变成追求精神的、实现爱的团结的情感。这就意味着，在与恶斗争的历程中，积极的精神苦修、自制、劝导等精神措施始终都是首要的、根本的抗恶方式，而外在的强制措施仅仅是它必要的补充，是为它服务的。只有在精神措施不起作用的时候，才能诉诸于外在的强制措施，而且，在实施外在强制措施的过程中，还要时刻有意地寻找可以中止外在强制措施的可能性。

可以看出，虽然伊里因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批判出发，但是，他并没有走向托尔斯泰的反面，勿宁说，他力求在托尔斯泰的基础上超越托尔斯泰。在给司徒卢威的一封信中，他曾如此表明自己写作这本书的初衷：“这本书不是打算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反题，而是要成为‘反题’+‘正确解答的合题’：抵抗总是通过爱，通过（1）自我完善；（2）对他人的精神培育；（3）剑。我不仅要推翻托尔斯泰主义，而且还要证明，持剑者所具有的爱的能力绝不比不抵抗者弱，而是强。一句话，我寻求解决上帝面前的、真正的宗教问题；我认为，它包含在东正教的古老精神中。”^①伊里因不是暴力和仇恨的辩护士，而是力求寻求实践中的最佳抗恶方式。在他看来，以强力抗恶活动是追求道德完善的人在各种精神措施无效的情况下诉诸外在强制措施对外在邪恶行为的强行制止，是他们暂时放弃个人道德完善的追求以成全社会公义的牺牲行为，因此，外在强制措施的实施除受各项前提条件的制约外，在抗恶活动结束后，实施者还应当进行自身的精神净化，从而抚慰自己那颗在抗恶活动中受到扰乱和变得冷酷的灵魂。

三、以强力抗恶思想的政治诉求

俄罗斯的思想家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注，伊里因也不例外。在被驱逐出俄罗斯后，伊里因集中精力首先思考以强力抗恶的合法性和相对性问题，这不是为了驳斥一个躺在地下十几年没有任何回应能力的已逝之人，也不是为了对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做无谓的纠缠，而是为了给他一贯倡导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论证和道德支持。伊里因认为，在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外在强制措施的主要实施者是国家政权，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措施，国家政权同样应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也有其应当遵守的限度。因此，他论证外在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相对性的最终目

的，是要驳斥否定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论证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限度。

作为一个清醒的政治哲学家，伊里因同样看到了历史进程中国家政权的缺陷。他认识到，国家在历史上常常沦为某些个人或者派别牟取私利、满足欲望的工具，成为在肉体上凌辱人、精神上压迫和奴役人的暴力组织，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即源于对历史进程中的国家政权的失望。在此，伊里因理解并同情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却完全不赞同他们否定国家的思想结论和实践主张，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拒绝的仅仅是国家制度的空洞形式，这种形式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应该加以拒绝的，但是，他们忽略了政治活动的真实内容，所以，他们批判的是那些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②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伊里因认为，历史上具体的国家政权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并不是国家本身所固有的不足，而是国家本质在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扭曲。在他看来，消除这些缺陷的方法不是否定国家本身，而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国家政权，并且让具有精神深度、政治智慧和道德品格的政治精英掌握国家政权，同时培育和提高了人民的法律意识水平，建立适合特定国家具体情况的政权形式，实现国家的本质。而从抗恶问题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将国家理解为人类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抗恶共同体，其使命在于：通过建立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和法律体系，保障社会的每个成员享有充分的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避免其中的成员受到恶的肆意侵害；保护弱小者、没有防卫能力的人，为进行精神创造的人提供基本的自由权、生存权和劳动权的保障，同时，还要致力于消除人们之间的相互攻击和排斥，力求铸就一个公正、团结、和谐的社会空间。

在赋予强大有力的国家政权以合法性的同时，伊里因还认为应当为国家政权的权力设置限度，使它不干涉其管理范围之外的事务，而是让教会去管理这些事务。他心目中完美的政治统治模式是一种权责明确、和谐共融的二元统治结构，即古老东正教传统中的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政体，他说：“古代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正确而且深刻地解决了教会与国

^① И. А. Ильин *Дневник Письма Документы* (1903—1938). Москва. 1999. г. С. 138.

^② 伊·亚·伊林：《法律意识的实质》，徐晓晴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家的相互关系问题,认为它们的活动范围是相互分离的,而它们的目的与努力则是有机地一致着的;它们的组织机构是相互独立、互不侵害和互不干涉的;军人会自愿地从僧侣那里获得精神性的、充满智慧的知识;并自愿地为僧侣带来必要的尘世福利。军人没有在自己沉重的负担下跌倒,僧侣也没有回避世界的重负。”^①而对于国家权力严禁涉足的领域,在《未来俄罗斯的主要任务》一文中,伊里因予以具体的指明:“国家政权有自己的界限”,“灵魂和精神的一切以爱、自由、善的意志为前提的创造状态,都不应遭到国家政权的支配,也不能受制于它的命令。国家不能要求公民去信仰、祈祷、爱、行善和信服。它不能干预科学、宗教和艺术创造。它不能命令人们表达情感或者观点。它不应当闯入道德、家庭和日常生活,没有极端的必要,也不应当限制人们在经济上的首创精神和经济创造。”^②这段话受到俄罗斯政治家普京的高度赞赏,曾被他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过。

关于国家的问题,是政治哲学中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然而,人们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走向相反的极端。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除了有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外,还存在着赋予国家过高地位的思想家,比如黑格尔,他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并对人的个性拥有绝对的权力。针对这两种极端的思想倾向,伊里因指出,无论是贬低国家的意义还是过高地估计国家的意义都是错误的,他说:“假如否定国家的活动是荒谬的、有害的和虚伪的,那么,过高评价国家的活动也是不被允许的、危险的和致命性的。就我的观点来说,国家的活动,在这个词的完整意义上来说是第二位的、预防性的、否定的,不是绝对的,也是不义的;但是始终是必要的、重要的、有力量的活动。我的书就专门研究这个力量的必要性和界限。”^③

此外,对国家问题的思考一直都是伊里因解读俄罗斯革命成因的一把钥匙,也是他规划俄罗斯复兴之路的理论基础。伊里因认为,俄罗斯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历史上俄罗斯国家政权建设的失败。历史上的统治阶层没有认识到国家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原初理由,也没有实现国家的使命,而是将国家政权变成了实现统治阶层欲望和利益的工具,并且无限地扩大自己手中的国家权力,使之毫无顾忌地干预人民的信仰、情感和精神世界。因此,在旧的统治模式下,人民被彻底排斥到政治生活之外,他们完全成为消极的被统治者和受压迫者,

这不仅歪曲了政治的积极本质,也破坏了人民的法律意识,从根本上腐蚀了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并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和俄罗斯的崩溃。在伊里因看来,革命就是被排挤到政治领域之外、经济上受压迫的民众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思想自由而采取的极端的反抗行动。对于民众的这种要求,是应当予以重视和尊重的。然而,对于他们实现这种要求的革命方式,则需要予以抵制,因为革命是对现有政治秩序、经济体系和道德基础的彻底摧毁,革命所造就的是一个政治混乱、经济停滞、道德底线尽失的社会局面,它既切断了既有的社会发展进程,也毁灭了此前历史中所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宝贵的精神成果。而且,在革命结束后,面对混乱的局面,以前从未受过政治训练的民众会束手无策,此时,来收拾残局的只能是一个新的专制政权,社会则会重新回到革命之前的状态中。因此,伊里因主张社会各界的精英联合起来用有组织的武装方式对抗革命,但是,在抵制住革命的浪潮之后,对政治体制弊病的反思与克服更是刻不容缓的,需要重新组织国家政权,将广大民众一同纳入到国家生活当中,培育民众的精神水平、法律意识、自治能力,建立一个既可以实现国家理念、其权力又不会过分膨胀的国家政权,这是俄罗斯彻底走出革命、走向复兴的必由之道;同时,这也是伊里因提出以强力抗恶思想批判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不抵抗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由之出发的政治理想。

四、关于以强力抗恶思想及其政治诉求的争议与评价

以强力抗恶思想的提出在当时的俄侨民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少人都从个人动机的角度解释以强力抗恶思想,将伊里因看作仇恨与暴力的辩护者,激愤难当,纷纷撰文予以批判,有人认为在战火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提出这种思想有些不合时宜,^④有人认为这是

① Иван Ильин.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ю//Почему мы верим в Россию. Москва. 2006. С. 575.

② И. А. Ильин. Основная задача грядущей России. О Воспита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литы. Москва. 2001. С. 24.

③ И. А. Ильин. Кошмар Н. А. Бердяева. http://anthropology.rchgi.spb.ru/pdf/64_Ilyin3.pdf.

④ Н. Бердяев. Кошмар злого добра. http://krotov.info/library/02_b/berdyayev/1926_312.htm.

一个自造的伪命题，^①有人则将伊里因看作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追随者，^②而在同时代人的如潮批评中，伊里因论证以强力抗恶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其要呈现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然而，时间是冷却愤怒、沉淀激情、显露理性的天然工厂，同时代人的激愤讨伐止息后，以强力抗恶思想最终还是在哲学家们那里获得了一个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洛斯基将《以强力抗恶》一书称为伊里因的“有价值的著作”，并且澄清了伊里因提出以强力抗恶思想的出发点，他说：“可能出现必然导致美好目的与不完美手段矛盾的情况，这是人的精神悲剧。伊里因和与他持同样观点的其他思想家们，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③古雷加也明确指出，“对伊里因的攻击是不公正的。”^④

在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观获得认可后，以强力抗恶思想中所蕴含的政治主张也逐渐受到当代俄罗斯政治家们的青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过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开始意识到包括伊里因的国家主义学说在内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伊里因在俄罗斯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他的全集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比那批与他同时被驱逐出境而在90年代又与他同时在俄罗斯受到热捧的宗教哲学家（比如别尔嘉耶夫、弗兰克、布尔加科夫）都早，而且，他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写就的政论作品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似乎具有了极其迫切的现实意义。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连续两次引用伊里因的作品，开启了当代俄罗斯政坛引用伊里因作品的时尚，而俄罗斯宪法法院院长和俄罗斯当代著名法学家瓦·德·佐尔金则说：“伊里因是俄罗斯强大国家战略之父，他主张建立一个以法、理性经济和入道主义为基础、不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却决定国家发展的优先性和方向的强大国家。”^⑤从本世纪初开始，俄罗斯在政治上也逐渐放弃了全面民主化的发展思路，着重打造强大的国家政权，同时，政治领导人又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限制国家权力的过分膨胀、不过分地干预经济发展、给精神文化创造留下自由空间的必要性。可以看出，在俄罗斯开启民族复兴之路的过程中，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家们有意借鉴伊里因关于国家的合法性和限度问题的思考，试图根据俄罗斯的具体情况在政权建设上选择一个既要强化国家的权力又要避免专制主义的中间化立场。

时移世易，曾不被俄侨民界知识分子们喜欢的学说，得到了当代政治家们的高度赞赏，伊里因的以强力抗恶思想以及其中蕴含的国家主义学说的命

运可谓峰回路转，然而，无论是当年的贬斥还是如今的褒扬，都充分说明了伊里因的学说深受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们关注的程度，而这已经足以使它成为俄罗斯伦理学史和政治哲学史上需要浓墨重彩地图画的一笔了。

就我们来说，在呈现出俄罗斯思想史上这个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说之余，还需要辩证地看待其中包含的问题。

首先，哲学家批判苏维埃政权的立场。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伊里因不认同苏维埃政权，甚至直接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最终被驱逐出境。伊里因对待苏维埃政权的偏激看法确实值得商榷，然而，却不能由此将以强力抗恶思想看作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渣滓，以至于让政治上的评价抹杀掉它的学术意义。对于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抗恶的问题和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始终都是非常纠结的重要问题，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学说提出伊始，就曾在俄罗斯社会引起过轩然大波，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札诺夫、费达罗夫、列宁等各界著名人士都专门撰文分析并评论这一观点，或者是持有保留的赞同态度，或者是予以激烈的批判，之后，关于它的讨论也从未止息过。20世纪各种形式的和平主义运动在各地的兴起又使托尔斯泰的学说获得了世界范围上的关注。可以说，托尔斯泰学说在俄罗斯甚至人类伦理学史和政治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大有争议和有待阐明的。以强力抗恶思想从对外在强制措施的相对必要性的理论论证出发，最终落实在对国家的合法性与限度的彰显上，使得对抗恶方式问题的伦理学探讨充当了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从其内在的逻辑推演过程来看，它既实现了驳斥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目的，也可以促使人们认识到需要不断审视托尔斯泰学说的必要性。因此，撇开政治因素，就其自身而言，作为一个

① 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По поводу книги И.И. Ильина,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й. http://anthropology.rchgi.spb.ru/pdf/68_Zenkovsky.pdf.

② И. Демидов. Творимая легенда. http://krotov.info/library/04_g/ipp/ius1.htm#str.

③ [俄]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④ Арсений Гулыга. Творцы Русской Идеи. Москва. 2006. С232.

⑤ Владимир Можегов.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как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 Ивана Ильина? <http://rusk.ru/st.php?idar=103317>.

论证严密、问题意识极强的学说，以强力抗恶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况且，伊里因虽然批判苏维埃政权，但是，他批判的立足点是基于他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探索，背后隐藏着他对自己祖国的关心和热爱，而不是基于个人的私心或者维护某种阶级利益的狭隘愿望。这一点也是后来纳粹德国争取伊里因为其进攻苏联的计划提供理论服务而被他拒绝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伊里因最大的愿望是俄罗斯能够脱离灾难，早日走向复兴，因此，即使是对苏联政权持有异见，面对打算入侵祖国的敌人，他还是坚持与苏联政权保持一致的立场，甚至受到盖世太保的连续报复也不屈服，直至最后被迫离开德国。

其次，学说本身所具有的空想主义色彩。伊里因的国家主义学说，包括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和为国家权力设置限度两个方面的内容，并且还在理论层面上为之提供了逻辑论证，然而，其中却蕴藏一个在实践层面上难以落实的重要问题，即应当如何为国家权力设置限度的问题。我们知道，伊里因反对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认为它会削弱国家政权的力量，其中包含着分裂和混乱的因素，不利于国家本质的实现，因此，他完全不赞同以制度设计的方式外在地限制国家政权的做法。这意味着，在他看来，对国家权力限度的设置只能是国家权力本身的自我限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掌握者要出于政治家的良知、责任感和复兴民族的使命感自觉地不僭越政治权力、不干涉人们的精神世界或者践踏社会道德的底线，而是使强大的国家政权成为复兴民族、培育公民精神的有

效工具。伊里因最终还是将政治理想的实现寄托于精神的力量，这必然会使他的理论在落实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推动力量，以至于流于空泛的道德说教，因此，在实践层面上的落实难度不可避免地给他的学说蒙上了一层空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对此，同样需要全面地看待。从古至今，为了改善人类既有的生存状态，思想家们曾提出过多种理论方案，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以至于当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产生出来至今，社会从来都无法完全按照他们所设计的理想方向发展，人们在实践中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可以禀持着理想的交往模式生活，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这些理论的尊重与推崇。相反，一些试图在实践中予以全面落实的理论在造成巨大的社会悲剧后却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论与实践之间本就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思想家的任务应当在于揭示问题、提出希望、给实践的主体带来启示和警醒，而不在于其理论是否得到了原封不动的落实。因此，伊里因的国家主义学说如若能够促使当代及后世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建立强大国家权力又要为之设置限度的原因及其意义，实际上就已经实现了其自身的使命与价值，至于既拥有强大力量又不超出自身限度的国家政权能否真正地在每一个国家中建立起来，则与各国具体操作政治实践的政治家们的政治追求和政治智慧有关。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周勤勤

Ivan Ilyin's Thoughts on Resistance to Evil by Force and its Political Claim

Zhang Gu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n "resistance to evil by force" is an important thought of a famous Russian political philosopher—Ivan Ilyin. Firstly, he demonstrates the relative necessity of exterior force, and then based on this he points out the validity and limitation of the state, thus making the ethical discussion of the way of resisting evil act as an academic base of political opinion. From the logical process, not only does he refute Tolstoy's "not resistance to evil by force" and his anarchism,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argumentation for his nationalism. Ilyin's nationalism is regarded highly by modern Russian politicians, including Putin; the study on his "resistance to evil by force" and his nationalism may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Russian developing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meanwhile, it also could provide us some suggestions in our stat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Ilyin; Resistance to Evil by Force; the validity of state; the limitation of state